

民国铁路客票的特点是:售票一律“无座”。那时上车拼命抢座,订座要额外花钱。这种制度下,“座位”并不是必需品,而是一种特殊享受,需要多花钱才能得到。1948年,沪宁豪华专列,这是民国火车车厢制造工艺的极致体现。

民国铁路售票一律“无座”

买票检票上车三次杀出血路

民国时期,铁路客车车厢主要有三种:头等车、二等车、三等车。这是法定车厢,一般每趟车都会加挂。比如张作霖被炸死时所乘那趟车,就加挂了头等车8节、二等车3节、三等车5节。

头等车一般是政府要员、外国人、大商人、社会名流坐的。座位为软座,铺着地毯,化妆室、卫生间等一应俱全,并且一般带有卧铺车。

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政府低级职员、白领和小商人等。座位也是软座,设备较头等车略差。有单纯的座车,也有附带卧铺功能的座车。后者白天是座位,晚上长椅为下铺,靠背支起当上铺。

三等车的乘客更加广泛,全是硬座车,车座为木质硬座。

以上三种车厢,全都是“无座”的:车票票面上只有发到站、票价、车厢等级等信息,没有座位号。所有乘客都是上车找座位,没有对号入座的说法。头等、二等车的车票很贵,且有身份限制,普通百姓不但坐不起,也坐不上。大多时候,这两种车厢比较空荡,上车不愁找不到座位。最痛苦的是三等车的乘客。那时候,乘车顺序一般是这样的:买票、候车、检票、上车找座。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,整个过程都是争先恐后,纷纷攘攘的场景。那时也没有预售票制度,火车票都是现买。大站开车前两小时开始售票,小站1小时。

买票要排大队。三种车厢的售票窗口是分开的,一般头等、二等售票窗口人不多,三等车售票窗口则是人山人海。大火车站周围,一年四季都活跃着替人买票赚钱的黄牛党。检票上车的时候,还要懂“潜规则”。当您排着长队等待检票,快轮到您时,突然听到检票员大喊:“客满了,停止检票”。此时常出门的旅客并不慌张,只

要上前递上车票时顺便递上一张钞票,检票员立即放行。无票乘客私下塞点钱给检票员,也能进站。

座位不是必需品而是特殊享受

那时,还有很多兵痞、流氓,他们上车往往大脚一横,一个人占了一排座,老百姓敢怒不敢言。以上种种乱象,都是因为没有对号入座制度。但要实现对号入座,最起码得满足三个条件:一是乘客数目不能超过座位数目太多。民国铁路设施极差,三等车通常人满为患。有时候车辆不够用,还经常开行“四等车”,这其实就是棚车,压根儿没座,更无号可对;二是有精确的车票管理系统,这一点要到计算机时代才能实现;三是列车铺号、座号要固定。

但民国的列车今天可能挂两节卧铺车,明天就可能挂五节。车辆的内部构造也不一样,今天挂的车有100个座位,明天挂的车可能只有80个座位。连标准、固定的编号都无法做到,对号入座更是空中楼阁。

那时的头等车、二等车也可以预订卧铺和座位。但是预订之后,直到上车之前,都无法知道铺号和座号。预订只是保证您上车有位子,而不是给您一张写有铺号座号的票。这与对号入座不是一回事,而且预订是要花手续费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开始对号入座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铁路逐渐开始实现对号入座。卧铺车较早,硬座车稍晚。在改为计算机售票之前,新中国的铁路车票和民国时期一样是硬板火车票。这种车票事先印制好,票面只有车站、票价等信息,没有标明座号。

实行对号入座后,售票员根据旅客需求,在硬板车票后面贴一张印有车次、发车时间和座(铺)号的

小纸条。硬板车票和小纸条结合起来,才是一张信息完整的火车票。铁路部门提供座(铺)号,不再另外收取预订手续费。

在硬板车票时代,实行“以无座票为基础,有座票作为补充”的制度。随着铁路的不断发展和计算机售票的普遍使用,铁路客票格局也变成了“以有座票为基础,无座票作为补充”。有座成了常态,无座票全价开始饱受争议。

国际上对待这一问题大概有四种模式:

一是“预定座位制”。很多欧洲国家,车票不指定座位,座位需要单独预定。有的国家收手续费,有的国家免费。

二是“双轨制”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铁路列车分为对号入座和非对号入座两种。对号入座车一般较为高级,如高铁。这种车也出售部分站票,站票有的打折(我国台湾地区),有的不打折(如法国)。非对号入座车一般是普通列车。如印度的低档列车,上车随便找座,票价极为低廉,车厢里通常挤得满满当当,车顶上也人满为患。

三是“一车两制”。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铁,有的车厢为指定席,有的车厢为自由席。两种车内设施完全一样,指定席对号入座,自由席不定座位,乘客上车找座。相应地,指定席票价更高一点。

四是全部列车对号入座,但也出售无座票,无座票不打折。目前我国实行的就是这种模式。

以上模式各有利弊。在有限的运力下,如何尽可能满足乘客的出行,又不失公平,这是摆在铁路部门面前的大难题。而这个问题绝非简单的“站票半价”,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的。

(据《新晚报》)

“民国第一案” 临城大劫案

民国时期,各地土匪为患,他们聚啸山林,拦路劫财,洗车劫船,绑票勒索。1923年5月6日凌晨,一场发生在山东临城附近的火车大劫案,震动了全世界。

在接下来的39天,事态的发展不仅导致了北洋政府空前的外交和政治危机,也几乎成为西方列强进一步扩大对华殖民战争的导火索。

5月5日,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第二次特快列车上,有一批身份特殊的客人,包括美国石油大王小洛克菲勒的妻妹,著名参议员纳尔逊的女儿,露希·奥尔德里奇,墨西哥著名工业家威瑞阿,美国驻华的记者鲍威尔等等。

凌晨2点49分,当列车行至距离临城站3里的沙沟山的时候,列车司机发现一节铁轨被卸了下来,他紧急制动停车。此时一千多名土匪已经集结在铁路的周围,他们由25岁的孙美瑶率领,有各地的流民、逃兵,和一战中从法国回来的中国劳工。土匪冲上列车,劫走了外国旅客39人,中国旅客71人。

事发当天,日本驱逐舰四艘就开到了天津港,水兵们登岸游行,抗议劫持事件。世界各主要报纸都在显要的版面报道了这一新闻。英、美、法、意、比五国的公使,连续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。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,迅速营救被掳的侨民,在北京的美国驻军要求迅速直接采取行动。美国国防部长也向国务卿建议出兵中国。

当时由于外国公使坚决主张派人与孙美瑶讲和,北京政府便把一切政务搁一边,集中全力办理营救外侨之事,派人与孙美瑶谈判。没想到孙美瑶开价的条件当中,不但要求北洋政府将他的土匪部众收编,以军饷的名义支付赎金,还要求北洋政府划出一块近万平方公里的中立区,由他的土匪军队对这个地方来施行自治。北洋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,谈判陷入了僵局。

被挟持的人质决定自救,从中推选出美国记者鲍威尔为代表与土匪谈判。孙美瑶就立即让步了,他只要求把现在队伍中有枪的人员编为正规军,由官府给款项作为经费。

6月12日下午,双方在枣庄附近的十里河签订了一个协定,人质获释了。北洋政府收编了土匪3000人,拨款85000元作为孙部六个月的军饷。部队番号定为“山东新编旅”由第5师节制,孙美瑶作了旅长。

半年之后,孙美瑶就被吴佩孚下令处决。9个月后,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,数百万平民流离失所,各地的散兵游勇又再次集结为匪。

(据《凤凰网》)

民国“好声音”是如何选出来的

1931年的一天,一个瘦小的姑娘走进上海明月社的考场,唱了一支民间小调:“我有一段情呀,唱拔拉给诸公听呀……”一曲唱完,女孩紧张地看着考官黎锦晖。黎锦晖和蔼地说:“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,只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,只要你刻苦练习,将来一定会有出息。”这个当年只有12岁的女孩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周璇。

也许你会惊叹,这场景跟当下火爆荧屏的“中国好声音”简直如出一辙。没错,民国时期,学员若想因“好声音”扬名,也需经“导师”考核。那么,当时的“好声音”是怎样选的?

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,广播电台是非常多的,光上海就有几十家,不仅没名气的人要通过它累积人气,有名气的人也要通过它增加自己的曝光率。比如,我们都知道的“金嗓子”周璇。1932年,周璇进入了明月歌舞团,并以一首《民族之光》初露头角。1934年,她参加了《大晚报》举办的“广播歌星竞选”。

“竞选过程有点类似现在的大众评委投票。”赵士荟说:“先在报纸上和电台节目里发布消息,竞选过程从5月份开始,大概一个多月后截止。其间,歌手们在电台直播间里一字排开,

听众通过电话现场点歌,然后把投票寄给报馆,报馆会每天刊登当天的投票数。竞选结束后,累积票数,得票最多的就是擂主。”

当年,那场比赛前三名的最终得票数分别是:第一名,白虹(明月社)9103票;第二名,周璇(新华社)8876票;第三名,汪曼杰(妙音团)8854票。周璇虽然只是第二名,但歌声却被媒体喻为“如金笛鸣”,也因此获得了“金嗓子”的称号。而获得第一名的白虹,也因此奠定了歌坛擂主的地位,获得了“播音歌后”的头衔。

(据《现代快报》)